

蛋壳的存在是为了包裹一个生命体，它是完整的、精致的，也是脆弱的、易碎的。
有的人可以轻易击碎它，有的人则把它看得高于生命……

BEIJINGERS IN 蛋壳里的北京人 THE 王春元 著 EGGSHELL 中国青年出版社

WANG
CHUNYUAN

BEIJINGERS

IN 蛋壳里的北京人

THE 王春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EGGSHELL

WANG
CHUNYUAN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蛋壳里的北京人 / 王春元著.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53-1387-0

I. ①蛋…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5324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孙文明

特约编辑: 万 芊

整体设计: 北京雅昌设计中心 孙文彬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 5735040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787×1092 1/16 20印张 300千字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5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前言

我是这样拧巴的

王春元

这几年无事生非地写了几本书，就阴差阳错地被称为“畅销书作家”。而这一次，好像偏要与自己过意不去似的，要写一本难以畅销的书。

我梦游一般地用了四年时间，无巧不巧地想和一群活跃在七八十年前的建筑文博学人对话，说说他们曾经试图改造而我正在居住着的这座城。这显然和这座城的过往有关。可是，过往啊过往，活在当下的人们谁还愿意劳神费时地听你说那些烟消云散的神游物外。我也曾尝试与这座城市的现代戾气沾亲带故，无奈，却凑不上趣。

好心人说，你可以调侃，你可以八卦；再不然，你还可以明朝那些事儿嘛。我不会，也不能。前车之鉴看多了，斧凿的铅华在黑黢黢的过往里临了只能是一丝灰烬。我的“轴”劲儿上来了，我偏要一笔一画地写，老老实实地写，在拙朴中让它的清新和隽永自行显现。

所幸，还有人和我一样拧巴。把印刷品做到极致的雅昌公司和它的创始人万捷先生，在“无纸化生活”摧枯拉朽般袭来时，他们却执拗地坚信，至美的纸版书籍是未来生活最后的奢侈品。

就这样，一个拧巴的写书人和一个拧巴的印书人拧成了一股更加顽固的绳，并且坚信：拧巴的日子也比扯淡的日子好。

两百位大师同一座城

七十年前，这座城市的任何犄角旮旯里都能意趣盎然地生长着大师；七十年后，这座城市的墓园荒冢旁总能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大楼。大师与大楼演绎着两个时代的对峙。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处在急剧动荡、飞速演进的时期，而北京这座城市则忠实地承载了这个衰老帝国反复更替的一切阵痛。时代的飞奔更带来了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巨大鸿沟，新思维、新技术的轮番冲击，不时刷新着人们尚未记忆牢固的各种理念。从旧制度、旧文化中幸存下来的老派知识分子，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显得僵硬保守，虽然试图把持，却总是不留神就被裹挟着冲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而那些敢于挑战和迎接风云变幻的人们，却如饥似渴地吮吮着时代前沿最有价值的营养，他们超越时代的言论和行为为这段历史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有人总结说，在中国三千年的思想文化长河中，曾出现了两次大的“文艺复兴”，第一次是两千年前涌现了“诸子百家”的先秦时期，一大批文化先贤绽放在整个神州大地上，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走向；第二次就是民国时期，尤其是1927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而地点却集中于作为“北平特别市”而存在的北京。在这里，诞生了影响未来中国一百年历史走向的不止两百位的思想和科学文化大师。

殉葬与陪葬的大师之死

我们无意在这里悉数大师们的时代伟业，仅就大师们的命运与这座城的生命路径发一些幽思与感喟，由此归拢城市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气脉的臻化和中断过程。

在旧时代的丧钟已经敲响之际，璨若星河的两百位大师相继在一个衰败拥挤的旧势力堡垒中，思考自己与时代的存在命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何保全知识分子的优雅与风骨和时代共进退是摆在那个时期每一位大师面前的历史选择。先秦的诸子百家，收归于两汉的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前车之鉴。一部分大师在时代面前表现出了顺势而为的变通性和灵活性，以自己丰满的学养热情投入到新的政治势力中，以博取更大的时代荣幸与政治荣耀，这部分大师我们称为“投怀派”，以胡适和吴晗为代表；另一部分大师则以冥顽不化的旧文化殉道者姿态示人，他们以充满仪式感的方式让自己的精神和着旧时代的堡垒一起沉沦，在精神上追求体面的死，干净的死，以杀身取义的方式宣示了对旧文化的效忠，死成为自己精神文化信仰的最终呐喊。这个阵容中以王国维和老舍为代表，我们称为“投水派”。

有人说：中国的精神，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的守正与忠诚之上的精神。忠诚也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和生命底线。王国维和吴晗之死，是过去一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非正常死亡的两条基本路径和分水岭。

黄学祥在《王国维的忧郁》一文中写道：我们心中的王国维忧郁而孤僻，在沉潜、古板的性格掩饰下是一颗饱含激情却又敏感脆弱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常常为天才所独有的、具有分裂属性的灵魂成就了这位一代巨擘。现实中人格的高尚与生活的幸福往往背道而驰，好比美学中的崇高多与悲剧相连一样。王国维所深深迷恋的具有启示般的悲观主义，成就了红学真正的开山之作《红楼梦评论》，解开了无数人心中的红楼之结，却没能解开自己心中的宿命之结。“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这与德国最伟大的哲人康德对人生的诘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向何处去，我们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出一辙。一部跨时代的《人间词话》更承载和成就了王国维的忧生之念，也是其对人生的质疑与悲悯的写照。

时世的纷扰往往加速悲剧的衍生。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清室遗老们东渡逃亡，成了广义上的文化遗民，目睹自己所珍视的传统文化随没落王朝一起衰败着，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行将崩溃，他不得不发出悲凉的凭吊。文化追求与传统政治的吻合，在这时成了折磨他心灵的酷刑。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绝妙的身受者，王国维灵魂中的悲剧属性使得他无法简单地回忆或惋惜，而是成为一个在时代废墟中寻找、捡拾着传统文化的独行者，也由此走向了宿命的不归路。

王国维在溥仪面谕下勉强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已经鲜明表现出其骨子里深刻烙下的传统之印。对文化信仰的坚守演变为在信仰底线上的苦苦挣扎，这种极致的痛苦正好诠释王国维登峰造极的传统文化造诣之由来，或者也算得上“文化洁癖者”的执拗，这种好比“传心”而来的文化信仰又一次为王国维的悲剧宿命立下了路标。

“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为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痛苦亦越甚；迨既达极深之处，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义尽也。”

——陈寅恪

1927年，清室王朝终于走到了轰然倒塌的节点，昔日承载着传统文化、伦理体系的最高标识——紫禁城，已然成为了历史的空壳。“我受不得一点辱”，在王国维心中，时代对封建王朝的讨伐早就等同于“人间”对自己精神的无情侵

略，而此时王朝和文化的颓败已然带走了他生命的意义。其精神所依附的文化信仰终于难逃浩劫，内心一再退让的底线已再无退时，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翘楚选择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迷恋的自决手法——投水，成为了文化的殉葬者，到死也独守着那份纯净的坚持（《王国维的忧郁》黄学祥）。“文革”中不堪凌辱，精神圣洁的老舍也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复制了王国维的诀别仪式。

吴晗，这位与这座城市有着剪不断、理还乱渊藪的史学大师无疑是走了与王国维、老舍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但细究起来，说截然不同似乎也不尽然，起始的学术造诣与结尾处的悲剧归宿看起来似乎大有相似，还有人更多地认为他不过是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但当我们揭开时代的破衣烂衫，寻起人性的本源时，就有了更多的观瞻。

许纪霖先生在《可怜一觉开封梦》一文中写到：当初胡适慧眼识人，吴晗已是当时历史界的明日之星。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胡适先生的一片栽培之心。《胡惟庸档案考》等著作的发布，担任《清华周刊》等学术刊物的主力，甚至破例被清华留校任教，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早已被公认，可以说这条学者的道路走得光彩又稳健。于是，人们只被他潜心求学的一面所吸引，而忽视了深深藏匿在他心底的热烈、执拗的愤世情感。

乱世从来不会顺从知识分子的单纯渴望，“五四”后愈加纷乱的局势让书斋里的学者难以沉潜心性，这是任何转型期知识分子被挤压的通病，只是病灶的反映不同罢了。血性与良知使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始终涌动着不安与烦躁，进而引发学者与热血青年身份叠加所带来的更大痛苦。社会关怀下的知识分子，一下子拥有了正义和勇敢的属性，传统文化的坚守开始让步于政治的洗礼。

许纪霖先生继续分析认为：1940年，在其夫人、董必武的学生袁震影响下，吴晗终于走出了书斋，开始过问政治。应该说，在那个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年代里，吴晗的确表现出了惊人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潜伏在他内心的热血与不羁开始操纵学者的命运，受教于传统教育的忠诚也随时代改变了方向：忠诚于谁？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缺乏安全感的，有人像王国维一样将精神系附于传统文化，就会有人像吴晗一样急切寻找某个阶级作为归宿来安放精神与信仰。毫无政治思维的吴晗选择了对组织的无限忠诚，大量充满批判性的时文取代了学术论文，史学研究出身的吴晗开始在时文中大放异彩。一部《朱元璋传》前后三稿，已然全无生动的个性和卓越的文采，吴晗牺牲的不单是一部著作，更是一个学者职业道德的彻底丧失，更是对学术领域真知的放弃与妥协。他已无法将政治与学术独

立开来，知识分子的身份演变成成为政治斗争工具，“为政治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已暗暗敲定了结局。

1959年初，为政治服务的《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最终成为吴晗悲剧人生的高潮，然而高潮即是终点。知识分子单纯而火热的本性使他骨子里的热忱最终完全演变为愚昧的忠诚，在纷繁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更是难以辨清方向，学者品格的失节最终换来的却是政治前途的覆灭。

在吴晗的《说“士”》中，他曾将忠诚定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认为中国人的精神正是植根于知识分子的忠诚之上，然而命运却戏弄般地让他像自己笔下的胡惟庸、海瑞一样，因“忠”而屈，因“忠”而死。可惜的是，王国维作为坚守的知识分子为自己的文化信仰殉葬，吴晗却是将知识分子的品格奉献给权势，成为政治陪葬品。

大师的第三条出路——中国营造学社

两条生存路线、两种文化主张泾渭分明地摆在了旧都和由它养护的大师们的面前，也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诉求的两种垮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边幻想自己像那只优雅的蛋一边继续苟且——他们并不情愿承认包裹精神的蛋壳早已粉碎，蛋黄、蛋清肆意流淌，留下的不过是古老紫禁城那有点类似蛋形的文化顽石。

是的，除了孤芳自赏的“投水派”与选边站队的“投怀派”，过往的历史并没有清晰指出大师们还有第三条路可循？

在翻阅民国年间的历史记录和散遗的档案中，本书中提到的马旭初的先祖马辉堂就在其中，他被记录在一个名叫“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团会员名录中。仔细查看这份落满了历史灰尘的泛黄材料，你会发现记忆中的很多文化、历史大师都赫然在册。这就让人们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了很久然后突然找到了光亮那样兴奋不已。这对于戛然而断流、失去寻觅方向的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变迁史来说，不止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惊喜，更是一条颇耐人寻味的大师们的第三条路径。

这样一条路径的开辟可能不是历史的主视角，但正是这历史的余脉和支流却也与时代并驾齐驱、隔岸相望，在几番无奈与彷徨后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大师自我救赎的生命路径，留下了为后人不断提及与感念的生活福祉。在璨若星河的大师阵容中，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一个北洋政客、老派文人朱启钤在旧北京城迎接新世界曙光的改头换面中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生命后期的优美转身和那段精彩爆发应该被这座城市牢牢地记住。



目录

001 序言 蛋壳里的北京人

A—017 最后一个哲匠之殇

A—031 兴隆木厂第十四代传人马旭初访谈

A—045 一个华丽家族的悲情谢幕

A—065 美迪奇家族

A—075 “样式雷”第十代传人雷章宝访谈

谁动了北京的第一块城砖	B—085
朱启铃嫡长曾孙朱延琦访谈	B—107
衰老帝国的最后一抹落日斜阳	B—121
建筑大师刘敦桢之子刘叙杰访谈	B—143
风情绝世的都市女祭司	B—157
梁思成遗孀林洙访谈	B—175
溥仪出宫 单老入宫	B—189
单士元之女单嘉筠访谈	B—207
一个蓝眼睛美人的北京乡愁	B—221
老舍之子舒乙访谈	B—251
罗哲文最后的沉默心声	B—273
营造学社最后一个会员罗哲文访谈	B—279
玩赏也可以是一道人生风景	B—297

C—313 北京城里的扯淡事儿（代后记一）

C—317 假如我是卡梅隆（代后记二）

D—325 参考书目

E—331 蛋壳里的北京城

——1900年后北京的城垣状况与拆除全记录

序言

蛋壳里的北京人

王春元

这就好比一个完美无缺的蛋壳，它是完整的，也是精致的、脆弱的、易碎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包裹一个生命体，我们的生命正因为有了它的包裹得以安享阳光的哺育，得以浸润四季的调养，默默期许自然的孵化。

有的人可以轻易击碎它，流淌一地的物质欲望；有的人则会精心呵护，将这层薄薄的壳看得高于生命。一旦这代表生命尊严的壳被击碎，他们肉体的存在也将化为乌有。

没有一个人伟大得过一座城

对于世居者和寻梦者而言，北京这座城绝不仅仅存在于他们生活的栖息地层面，经年累月的生活研磨，轮换有致的四季调律，她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心头演化为一个冲不散的谜团，一股缠绕不清的漩流，并随我们的生命本身翻滚，上升臻化为一个族群的气脉。

对于这座城市的精神存在，谁能说得清那是什么？人们或许基于零散的认识，说它是成熟的、欢乐的、素雅的，或是随性的、异教的、叛逆的。千百年来，和帝王气韵混杂在一起，人们开始对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形成了我们灵魂深处的共同约定和持守。这或许就是久已存在于市民生活方式里的世俗信仰，也可以称之为城市精神。

或远或近，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人们身上，无不渗透着一种盲目而不自觉的内心炫大；或亲或疏的人们在远行和久别之后，心头无不堆积着一份莫名



水经注

的乡愁苦恋。

所有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个性，它深深地烙下了已逝者的超越生命的印记，就像拿破仑和戴高乐在巴黎留下了他们的印记，玛丽娅·特利莎和贝多芬在维也纳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一样，永乐、乾隆也将他们的梦想载入了北京城的史册。

或是出于对权势的崇拜与炫耀，或是基于历史的惯例，确有夜郎自大之徒妄图在这种久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欢乐诉求之上涂抹自以为是的斑驳色彩，然而这被历史清晰地证明是一种徒劳。从而也使更多的人清醒地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伟大得过一座城。北京亦然。

那点儿蛋事

我有一个朋友叫赵宏，是北大考古专业的博士，古青州博物馆的馆长。四年前，他从青铜时代抽身出来，在北京西南边的房山承包了一座荒芜的山头，在那里放养了几千只濒临绝种的芦花鸡。目前已然颇有影响和收益，每逢节假日各大饭店的订单供不应求。

坐在他那用古朴方式搭建的柴锅桌前，我们一边品尝着原汁原味的芦花鸡，一边聊起了鸡与蛋的问题。

知识分子养鸡与农户就是不一样，他能从中悟出别的道理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一只鸡蛋是一个生命体，由蛋转变为鸡需要很多必备条件：首先它必须是鸡蛋，而不是石头或其他，这是生命的根本；第二，必须在昼夜平衡的状态下、温度适宜的环境中以及其他合宜的条件，经过二十一天的孵化，才能呈现出生命的特征。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是绝对孵不出小鸡来的。更进一步说，一只小鸡从出生到生长到能够产蛋，它有质量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四百五十天左右，而每只鸡大约能够产一百到三百五十个



拿破仑



奥地利女皇特利莎

蛋，超过这部分的产出就被称为没有质量的劣质蛋，只能作工业用途了。

鸡蛋这样一个生命过程，令人自然联想到了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像一只完美的蛋，优雅，但是易碎，需要给予精心的呵护——蛋壳就像他们的精神存在，如果被打碎，就模糊了蛋清和蛋黄的界限，失去了其存在的最基本格局。知识分子正因为有这样一层蛋壳，才使自己的生活独立于社会普通文化消费之上，达到相对的超脱，才能够保证其与社会并驾齐驱，并引导精神文化的走向，他们的品格和言行也体现了社会道德与伦理的优雅层面。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如同徐志摩可以把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那样的富于魅力和想象。

假如我们把建于精神之上的北京城比作一个完美无缺的蛋，一个具有精神物象的生命体，那蛋壳就好比城墙，蛋清就好比九经九纬的棋盘街、四合院，蛋黄就是紫禁城。如果包裹生命体的蛋壳被打碎了，只留下化石一样孤零零的紫禁城，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找寻这座伟大城市的生命体征？

北京，故乡乎？

城市是人建造的，而我们可以感知的时间不过百年。向后看，一系列看似和我们无关，却又和我们的生命、情感、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紧密相关的问题出现了：是什么决定和影响城市的演进？百年间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情足以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向并让我们不断地思考下去？哪些人物值得永久地存留在城市记忆中并让我们感怀？在我们可以追溯的时间里，我们有限的生命个体感受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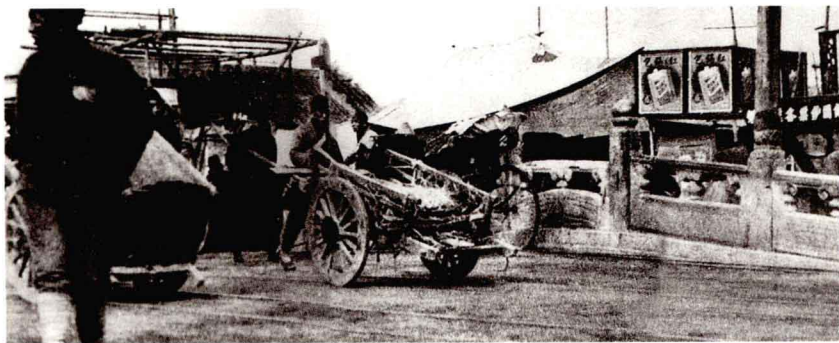
尚在懵懂时期，我们就被不变的传承轻而易举地遮住了灵性的眼睛，无目的、无规划地挑选了城市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观瞻。我们和城市一起成长，那始终无法忘却、像浮云一样存在过的城市断面和碎片，使我们打上了

深深的城市文化烙印，也许就构成了儿时记忆中并不清晰的城市面孔。著名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这话听起来入情入理，但仔细对照我们当下生活中每个人不同的存在轨迹，又会产生诸多不同的侧面——母亲的面孔倒是清晰的，但故乡的面孔在哪里？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完整的地域描述，也无从寻找情感记忆与现实对应的那个坐标点。

我理解的故乡，是一个族群的自然栖息地，我们的先人在那里渔猎、劳作，在那里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我们因此有相同的肤色、相同的血脉、相传的基因、相似的长相、相同的语言、相同的习性，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文化气脉。亘古不变的山川地貌构成了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从那里出发远行，最后又回到那里，并选择先辈们最亲近熟悉的地方安详地死去，与天地山川共融化、筑永恒。

一些与我同处于一个时代、有相同政治文化背景的人们，是无法选择和长期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连续的故乡情境的。我们几乎注定了会让自己的生命从原点出发，在漂泊中遗失。我们精心编织、努力搭建的理想生存环境往往是个错误，并且义无反顾地错下去，这种“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混乱生活让我们的生命看上去是如此的轻率、脆弱和卑微。

天桥之桥（为清末民初改造后的照片）



三十年前的那个在记忆中抹不去的秋天，我从银川乘坐170次列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城。庞大的北京火车站里，积满了各种寻找归宿的人。在湿漉漉的秋雨中，我们被接新生的校车俘获，隔着模糊的玻璃，外面是朦胧而陌生的世界。依稀觉得我们是在向郊区行走，终于到达目的地，就是位于东郊被称为定福庄的校区，这便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了——北京广播学院。

三十年前这个细雨朦胧下午里的城市面庞，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那时候的广播学院，到处都是浓荫参天的核桃树，核桃林里闪开的蜿蜒的小石径上不断晃动的是五颜六色的花雨伞，雨伞下是面庞生动的漂亮女生和气质俊朗的风华少年。三十年过去了，这幅画面从那个湿漉漉的午后逐渐凸显、清晰、定格，勾勒出一张张国人熟悉的面庞——敬一丹、李修平、周涛、崔永元、白岩松、毕福剑……构成我“新故乡”元素的主画面。这座城市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横亘在我面前，它给了我一次从原点解构的方式。但也许是时间太久远了，也许是我呈现出了生命的另外一种姿态，纷乱的头脑中始终无法有一个连续的声音，而是无数碎片不断地勾连我与这座城市的所有断面。

这三十年来，我几乎住遍了北京城东西南北中的所有方位，我也有了北京土生土长的妻儿，与它有了斩不断的血缘关系；如果没有大的意外，我也将终老于这座城市。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准确地给出“北京城是什么？”那种属于我自己独特的、能让我自己融解消化的答案。就像恋人不断问你“爱她什么”那样无法回答。像自己头上一个飘忽不定揣摩不透的气团，却如影随形地笼罩了你生活的一切。三十年了，却始终无法说清北京在我心中的样子。

很多刚进入这座城市中的人也与我一样，无法说清北京究竟是什么。地理概念上的“大”也许是一个障碍，住在朝阳的人 would 认为北京就是CBD国际商务区，住在海淀的人就认为北京是大学城、科技城和中国硅谷，住在崇文宣武的人 would 认为北京就是国粹与杂耍的集散地，而住在东城西城的人就认为北京是党中央，或是王侯贵族皇亲国戚的乐园。每个人都说对了一部分，但

结论却如盲人摸象。

于我而言，从三十年前踏进这个城市的那个时刻起，北京城就进入了一个高速蜕变期，即便你跟着时代的脚步加速奔跑，也无法占尽这个城市每一处值得记忆的空间，甚至来不及加注记忆的标识。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五环路、六环路不断由里向外的扩延，一次次像推土机般铲除了刚刚形成的脆弱记忆，就这样循环往复地不断被标注，不断被涂改。每一处地方，好像是熟悉的，转而又陌生的，仿佛生命也被一段一段切割，抛掷在不同的城市格子里，每一处都是零碎的、散佚的、不连续的，永远有重新开始的感觉。

我们因何会苦苦挣扎在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并试图把她故乡化？正如大家看到的，今天的这座城市一切都在恶化和过度化，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人文环境，甚至政治、学术、教育环境，涉及生命中每一个不可缺少的领域都让我们欲罢不能地痛苦。在此之前，我们未曾料想历史会把我们投掷在这样一个过度的发展期上，而她必然要带给我们对生命、对未来的终极叩问。

在这样的时刻，看看达尔文、看看霍金、诵读佛经，你也许会说北京城里什么都是浮云，什么都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堆碎片和粉尘。人这样觉悟得过头了就容易幻灭。我们生命中的所有欢乐和痛苦都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被过度挤压而变形了，无论你是自愿还是被迫，只要生存在这里，就无法摆脱被驱使的感觉，这是我和这个城市的基本关系。

现实如此的令人不满意，我们便试图寻找精神生存上的另外一些答案，那就是自说自话地告诉自己活在这儿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你与这个城市可能形成的一种精神关系。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似乎能够触及一些基本层面，那就是我们必须在生活理念上与这座城市建立起相互融通的精神契合。这种契合，存留了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寄望。

对于那些进北京出北京也许就是人生转折点的人而言，政治意义上的北京不是这个城市内在的生活肌理，那样的城市形态也不是长久生活在这里的普通大众的内心诉求。对于自身生活环境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

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处在不同的位置，怀揣不同的欲望，感受不同的城市风貌，每个人都像摸象的盲人，坐井观天、一叶障目。

这份无奈的徒叹和文化的悲情亦将跟随城市变迁一起回响在历史的古道斜阳里。于是我想，应该在历史时空和个人心灵上挖掘出一条路径，进而使这一路径有利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构建与这座城市的精神关系，也许这样一种对应关系的存在能让我们在未来的生命旅程中多了一份让自己快乐的理由。有了这样的立脚点，我开始有意识地找寻这座城市营造的原始起点。

建于精神之上的一座大城

为什么说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筑于精神之上的大城呢？林语堂曾说：“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像北京一样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和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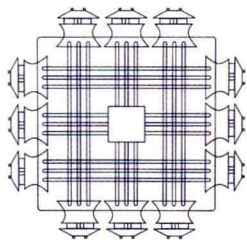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发轫于江河的两岸、海洋的沿岸、水草丰茂的绿洲，由小村落、小集镇、小城堡逐渐演化而来，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一条基本路径。而唯有北京城，从它诞生起，就是一座举世瞩目的大城。而这个大城不单是地理概念的，更是精神概念的，因为它是建于思想上的一座城市。

世界上可以称之为“大城”的地方少之又少，北京却从创制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它是一座“天生”的大城。要说明这一点，还得从两千二百年前的一本书——《周礼·考工记》说起，它是解密中华城市精神存在的起点。

中国人的礼仪规范、伦理纲常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已经被清晰明了地规定了下来，成熟稳定的道德人心教育已经臻于完美；以至于面对今天的礼崩乐坏，有人说自东周以后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不管怎么说，当欧洲大陆尚处在海盗猖獗、民生凋敝的蛮荒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按等



周礼·考工记



周礼·考工记——街道

级规制生活了。而居住环境的规制则是最能够体现这种文明的一种方式——天子居于什么样的地方，建多大规模的宫殿？这些都已有了明确的规定。

“建筑”一词本是上世纪初由日本传来的，中国古代对于宫殿的建筑一直叫做“营造”。在最早见诸文字的《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对营造都城做了如下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大概意思是说要建筑国王的宫殿和都城应该是一座方形的城池，每边的城墙应该长九里，城墙的每一面上各开三道门；城内纵横的大道各九条，形成互相交叉的棋盘状格局；左边应该有供奉祖宗的庙堂，右边应该是供奉社稷永续平安的坛；天子居于中间面对朝臣，处理国家大事；后边是供内宫和家族生活的场所。

而林语堂所谓“近于思想，注重自然、文化和生活方式”则来自于道家的基本学说，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这种以一条纵轴为中心向两侧铺陈开来的都市格局，也充分体现了古代帝王取法道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计思路。中国古书《白虎通》中说：京师乃四方之中也，王者必居其中。这一“择中论”的设计思想在东周的另一重要典籍《吕氏春秋·慎势》中亦可见端倪，上面明确规定：“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周礼·考工记》、《吕氏春秋·慎势》所表述的建筑思想从那时起就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两千年的营造历史。

中国古代不但有成熟的有据可查的建筑理论，同时也形成了最早的建筑美学思想，它来自于更加遥远的一本古代典籍《诗经》：“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曲，缩版以载，作庙翼翼”；《诗经·小雅·斯干》中又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君子攸跻”。这几句话是关于我们居室形态的形象化描述：我们的房屋应该修得端端正正像一个站立的人，厅堂又像急速穿行而过的箭一样笔直明亮，屋檐宽大飘逸犹如一只大鸟在空中展翅飞翔，色彩应该艳丽如锦鸡身上的羽毛，这样的话君子就可以登堂入室了。



诗经



营造法式